

那个长大想当官的孩子真的可笑吗

4

热点关注



滕朝阳 著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然而,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多的似是而非,太多的跟风盲从,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并上升到教育理论,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

上期回顾

说到底,每个人都不是历史中间物。但其既是一个过客,又是其间的一环,所以个体才有可能从生命的无意义获得意义。

我们听得多、见得多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理想”,比如上什么大学、干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并按自己的理想去培育孩子。但孩子的理想是什么呢?相信一些家长很少关心,所以并不清楚,或者孩子即使有所表达,也并没有放在心上。如果让他们大胆说出来,或许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有一次在单位,看了一封读者来信,谈的是两个10来岁孩子的理想。一名男孩的理想是:我长大后,希望买彩票,中500万元,然后周游世界,剩下的钱,用来买一个官做。另一名女孩的理想是:我长大后要嫁一个有钱人,读书是没有用的,有一个阿姨并未读过什么书,嫁了一个大老板,吃喝不愁,整天开着车上街兜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当时似乎有点吃惊,就随手记了下来。这样的理想描述,是不是让成年人大跌眼镜呢?但请把眼镜扶好。我们能说,这样看上去不成样子的理想,不是社会风气的折射吗?然而,孩子就是孩子,便是连这样的理想也还算不得高明。比如那名男孩,若中了大奖,先买个官做,岂不是连周游世界的钱也省了吗?现实中,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有一个地级市的领导,不是已经用公款考察了60多个国家吗?然而,也不过过了两三年,有记者采访广州刚开学的小学生,一名一年级新生在谈到自己的理想时,非常认真地说:“想做官。”当记者问她“想做什么官”时,这位小学生想了一下,毫不犹豫地说:“贪官!因为贪官有好东西。”从想买官到想做贪官,社会在不断进步,孩子们的理想看起来也在与时俱进。

我们小时候自然也有所谓理想,比如长大后要当科学家、当白衣天使、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郑重

其事地写进作文里。不过,说是自己的理想,其实也是“被理想”,都是成年人灌输引导而成。和我一样的农村孩子,真正的理想恐怕还是拼命读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做个“城里人”。但这样的理想好像很庸俗,说出来丢人,若实话实说写进《我的理想》,非得低分不可,或者还要被老师提醒注意思想倾向。后来又怎样呢?想当科学家的,连科学的边都挨不上,当上了小老板;立志当老师的,上了师范类院校,毕业时托关系找门路,坚决不当老师,改行做了公务员。理想与现实有差距,不是想怎样就怎样,但从前理想教育的僵化且不切实际,也是理想往往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们做小孩的时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类的远大理想,似乎已不太流行,现在则几乎销声匿迹了。这当然不足以构成嘲弄崇高的理由,但每一代人的理想都不免受时代风气影响,大约也是事实。如果成年人不去刻意灌输,孩子们的理想就既不空洞缥缈,也不会整齐单一,而是现实而具体、丰富而多样,且充满不确定性,决没有一条道跑到黑的执着。

我儿子在5岁时,理想就发生了好几次变化。最早是想做一名厨师,后来又想做一名警察、一名建筑工人、一名消防队员。老实说,当听到儿子的理想“不过如此”之时,我确有点气馁。人们都主张“少年心事当拿云”,当大官、赚大钱、做大事,他却是“拿勺”、“拿砖”。不过也没有去打击他,而是告诉他,就是做厨师,也要做个优秀的厨师。一则因为他的理想变来变去,不必太较真;二则他的种种理想都有现实依据,难以反驳。想当厨师,是因为厨师做的饭好吃;想当警察、建筑工人、消防队员,是因为警察能指挥交通、建筑

工人能开大吊车、消防队员能灭火,都是很“神气”的事。这样的理想自然无“大志”可言,却也合乎改进生活的目标,至少对社会有益无害,有什么可否定的呢?到了三年级,儿子的理想又变了,想当一名地质学家,研究地震。这同样不是无来由的,因为那时,日本刚刚发生了大地震。

朝三暮四的理想,还能成为理想吗?在我看来,小孩多变的理想或许幼稚,却不可笑,至少不比一个风烛残年的人还怀有雄心壮志更可笑。小孩的未来充满可能性,他们可以有无数的梦想。他们的理想变动不居,恰恰是世界在他们幼小心灵的真实呈现与反应,是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日益丰富的表现,也是他们不断发现价值和选择价值的体现。如果我们对孩子的理想负有引导责任,那么,帮助他们确立正当有益的价值观念,正在这个过程之中,而不在这个过程之外。倘若孩子在不断变换理想,家长却无动于衷,则很可能错失引导孩子塑造价值观的良好机会。有一次,碰到一位母亲,她上小学的女儿以十分羡慕的口吻,说她妈妈当秘书真好,有车开,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又不辛苦。我当时很吃惊,但更吃惊的是这位母亲对此没有任何回应。

我上小学的儿子有时也羡慕有钱人,说自己以后要学做生意,甚至问起我们的“家底”来。我们当然不是有钱人,却也没有达到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总之是告诉儿子,有钱人有他的好,钱虽不多够过日子的人也有他的好,生意更不是你像中那么好做的。儿子有时很有点瞧不起我从事的工作,我也不认为写文章真的就是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你不好,那么希望你以后不要像我一样。照我不懂的“星座说”,儿子是“天蝎座”。一次

和他到小商店买了一个与“天蝎座”有关的小玩意,有关于财富、家庭、健康、荣誉一类的文字说明。我问:你能不能根据你所理解的,依重要性大小把这些排一个序呢?他想了想,回答是健康、家庭、荣誉、财富。对这个价值序列,我有点意外,随即表示了赞赏,并强调说健康是1,没有这个1,其他的都是零。

据我观察,有的家长并不是在孩子理想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引导,而是和自己从前所受的教育那样,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孩子的理想。不止一次,我听到有的家长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否则以后就赚不到大钱。还有的家长官本位思想严重,一心想让孩子以后当大官。这样孩子就有可能把赚大钱、当大官作为奋斗目标。但世界上,赚大钱、当大官的总是少数,都往这两股早已人满为患的道上挤,很多人的理想便难免要破灭。事实上,一些大学生毕业后,在求职、工作中正是深受此种单一价值观的影响,有的作茧自缚,有的难以化解内心冲突酿成悲剧。

在孩子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中,社会影响力自不可低估,但家长的作用更不可或缺。老话说得好,身教重于言教。但在身教之外,言教也必不可少。

在家长之外,另一个重要主体便是老师,他们对孩子的理想和价值观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曾经有一个老师,在学生面前主张读书就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我想,这个老师以之作为自己的理想自无可,却决不应该这样去误人子弟,指导自己的学生去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老实说,现在的孩子以中大奖、买官做、做贪官或娶有钱人、嫁有钱人等为理想,错不在他们,而是这个世界的理想出了问题,价值发生了颠倒错乱。

1995年春晚我和妻子在北京团聚

2

名人传记



朱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零点时刻”:荣光时、黯然时、欢歌时、悲泣时……每个时刻的感悟,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

在书里,朱军将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突出重围,战胜对手,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他和范曾、赵本山、周涛、董卿、冯巩等人的情谊,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上期回顾

2005年除夕,我和冯巩在春晚表演了以《艺术人生》为蓝本的小品《笑谈人生》,这个小品取材于我们的真实人生,所以每次排练都会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有一位外国作家阿代尔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是真真切切的,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但它有一个大敌,就是生活。我和梅梅结婚这么多年了,经受了传说中七年之痒的考验,也迎来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孩子。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俩的感情却历久弥新。

我和梅梅的爱情萌芽于槐花盛开的季节,悄然绽放在领导特许的一缕阳光之下,为我们照亮这束光的正是时任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艺术顾问的许秀林老师。当时,我还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在一次谈话中,许老师有意无意地提起:“我发现咱团有个姑娘不错。”我问:“哪个?”“舞蹈队的谭梅,这孩子不但漂亮,还比舞蹈队其他的孩子懂事。”许老师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那时候我已经注意梅梅很久了。刚到“兰战”时,我在一次打开水的途中偶遇了梅梅,当时的她穿着背带裤,正和同伴们蹦跳着勾槐花。还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梅梅的笑脸和阳光一样明媚。想起这个情景,我傻傻地回了许老师一句:“我也觉得她不错。”许老师心领神会地一笑:“那这事就好办了。”

后来,许老师为了撮合我们俩,在梅梅面前帮我说了不少好话,甚至还编了瞎话。他给梅梅做工作说:“朱军这小子好啊,重感情,讲义气,业务又好,长得又帅,家里还是万元户……”其实,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刚刚有所好转,离所谓的“万元户”还差得远呢!

1989年我们开始相恋,那时候她才18岁,还是部队文工团的学员,属于战士身份。按照部队条例规定,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所以我们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地下恋情。1991年,她提干,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在部队有一种说

法,男女双方的年龄加起来够50岁才算晚婚,而军人必须遵照晚婚的标准。于是,等到梅梅22岁,我熬到了28岁,我们俩才结婚,显然我的年龄“优势”做了不小贡献。

199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99周年,也就是在这天,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冬至刚过,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梅梅的小脸冻得通红,我帮她把围巾整理好,一种一定要把她照顾好的责任感在我心里变得强烈起来。我很郑重地拉起她的手,向她坦露了我的心里话:“我家孩子多,从小日子就过得很紧张,咱们结婚本来是好事,办婚礼就不要再给家里增添负担了,我们自己有多大本事就办多大本事的婚礼,不要家里一分钱,我不要,你也不要,好不好?”她点了点头:“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爸爸走了以后,妈妈为我们姐妹三个操了不少心,我不该再让她受累了。”

许老师没有说错,我更没有看错,这个姑娘不但漂亮,而且懂事。此时,我的心中充盈了既幸福又心酸的滋味,我真想把她拥在怀里,告诉她拮据是暂时的,以后的日子我会拼了命地对你好,让舞蹈队里所有的女孩子都嫉妒……这话我没说出口,但一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心里却就此埋下了一个简单而执著的夙愿:哪怕是自己动手,也要给她一个最好的家。

“兰战”歌舞团营职楼一单元402是组织分给我们的新房,就在我从小住的院子里,离我父母很近,是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两居。新房的装修方案是经过我们俩几番认真讨论才最终确定的。那时的梅梅还完全是一个小女孩子,她幻想着自己能像公主一样,住进宫廷式的婚房,而我就像圣诞老人,不声不响,全权负责实现她美妙的梦想。她喜欢家里

主体是纯净的白色和粉色,于是我就买了一套水粉色的沙发,定制的家具的颜色也迎合了梅梅的想法,二哥、三哥帮我一起刷漆,白色的底,粉色的边,三个大男人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地描画着我们小两口的新生活。1993年3月28日,我们在兰州西北宾馆举行了婚礼。当年享誉西北的笑星张保和为我们主持,兰州军区的政治部孔副主任是我们的主婚人,甘肃广播电视台厅长海飞是证婚人。在领导、战友、朋友和亲人的祝福声中,我和梅梅成了一对幸福的军中小夫妻。

“兰战”营职楼一单元402那套房子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然而不到一年,我就顺着杨澜、高立民老师指的路去北京闯荡了。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一面恋着甜蜜的小家和在兰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基业,一面望着遥远的北京和一个海市蜃楼般的美好前途,犹豫不决。对于新婚夫妻来说,分别无疑是痛苦的,但梅梅是一个明事理、有见识的姑娘。在我还抱怨去北京汇演的名单里总是没有我时,她就已经随着舞蹈队去北京演出过很多次了。

当我试探着跟她说了想去北京闯一闯时,她没有丝毫阻拦。“去吧,不用惦记我,你好,我就好了。”从此,这句话就成了我们夫妻间独特的相处之道。恪守着这句话,两个年轻人开始了携手奋斗、甘苦与共的人生之路。

带着两件衬衣和几千块钱,我单枪匹马地来到北京闯荡,当我最初在电视台整天忙着给人擦桌子、倒水、订盒饭,前途一片茫然的时候,“尽快好起来”成了支撑我坚持下去的信念。没想到,促成我和梅梅在北京团聚的竟是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一年,春晚群舞演员以“兰战”歌舞团和吉林歌舞团两家做

班底,梅梅也在其中,当时她参与演出了开场舞,还为那英的《雾里看花》、赵丽蓉老师的《如此包装》等多个节目伴舞。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参加春晚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哪怕只是作为群舞,梅梅也很骄傲。当她看到杨澜、倪萍、许戈辉的时候,就像小粉丝一样跑过去与她们合影。

1995年,我已在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打工近两年,可当时我还是临时工的身份,与春晚更是扯不上一点儿关系。为了多看梅梅一眼,我经常在排练大厅门口偷偷看她们彩排。一群跳舞的女孩打扮都差不多,但我一眼就能把梅梅认出来,就像当年下部队的时候给她们打追光一样,我的目光就是灯光,始终追随着她一个。

大年三十晚上,我去了春晚直播现场,那时我还只有临时出入证,在工作的8小时之外是进不了台的。去朋友家吃饭回来已是晚上10点多,恰好我和值班的战士比较熟,他没怎么难为我就放我进去了。进入春晚演播大厅之后,我一直站在门口,台上载歌载舞,异彩纷呈。从我的位置看那个舞台,美轮美奂,真实无比,但我觉得它又是那么遥远,遥远得令我绝望。作为一名文艺节目主持人,我不知道要努力多少年才能冲上去,要怎么努力才能冲上去,还是无论怎么努力都冲不上去的。但我心里总潜伏着一种隐秘的向往,向往什么呢?又无从说起。于是我提前离场,回到了租住的小屋。

当梅梅兴奋无比地带着春晚的气息回来时,我好像要把输掉的一局扳回来似的:“你等着瞧,我以后一定是中央电视台最好的主持人!”不知道当时的我是哪里来的底气说这样的话,我期待地看着梅梅,仿佛成败的答案就在她的眼睛里。她只说了一句:“我信你……”